

美国巨额全球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 ——基于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的研究

冯 彩, 王叙果, 何暑子

(南京审计大学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为改善贸易逆差的状态和规模,1980年以来美国多次对他国发起以“汇率”和“关税”为手段的“贸易战”,但均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长期巨额全球贸易逆差的事实。以开放经济国民收入恒等式为基础,推导出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使用该模型分析1980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

关键词: 贸易逆差;内生来源;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0)04-0022-08

一、引言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1973、1975年除外),美国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迄今已有40多年之久。为改变其贸易逆差的状态和降低贸易逆差的规模,美国曾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过以“汇率”和“关税”等为手段的“贸易战”。但历史经验和现实数据均表明,美国贸易逆差的状态和规模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善。正如同 Ronald McKinnon (2013) 所认为的“通过美元贬值或者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1]。”

Rudolfs Bems 等(2007)对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产生的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长期恶化现象,根源在于美国内部^[2]。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也指出“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内生性、结构性、持续性的经济现象。”导致美国贸易巨额逆差的内生经济因素是什么呢?本文基于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推导出贸易差额的内生性模型,系统研究决定一国贸易差额的内生经济因素;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分析1980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进而提出改善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1980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演变特征;第三部分为贸易逆差内生性模型的推导;第四部分将使用贸易差额的内生性模型,对美国1980年以来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1980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演变特征

对1980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进行分析可发现,其呈现如下的演进特征:

(一) 巨额性

本文使用贸易逆差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度量美国贸易逆差的“巨额性”。从图1的数据可知,美国的贸易逆差绝对规模大,相对比例高。

从绝对规模看,美国是全球贸易逆差规模最大的国家。2006年贸易逆差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600多亿

收稿日期:2019-10-23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三期南京审计大学应用经济学(苏政办发[2018]87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2DA07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EYC005)

作者简介:冯 彩(1977-),安徽砀山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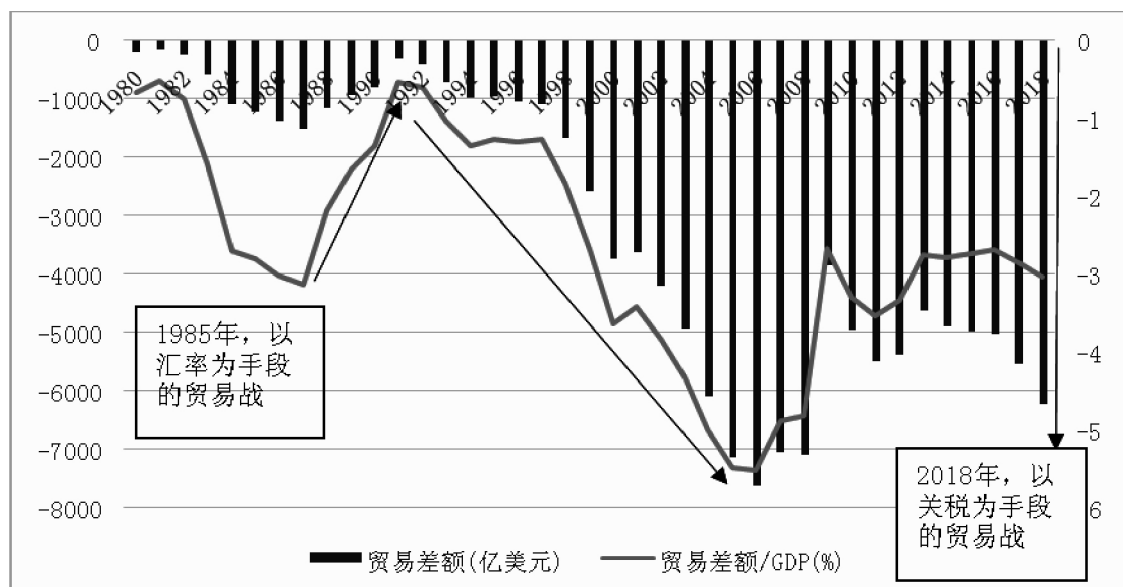


图1 1980-2018年美国贸易差额及其占GDP比例的动态演变

数据来源:基础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经本人整理得到

美元,达到历史性高点。次贷危机爆发以后,贸易逆差有所减少;但是2013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又呈现攀升态势,2018年逆差规模又高达6200多亿美元,达到了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从相对规模看,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居全球最高。2006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达到了-5.51%;次贷危机爆发后,该比例有所下降,但是2018年该比例又超过了-3%。

(二) 全球性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贸易逆差具有全球性特征,即在给定时期美国同时对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102个国家同时存在贸易逆差。

选择1985、1995、2005和2018年作为1980-2018年间的代表性年份,梳理上述年份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地数据,其中,这里的贸易逆差使用的是货物贸易逆差数据,不包括服务贸易数据,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第一,1980年以来美国同时对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第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21世纪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如同国务院《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所指出的“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阶段性、国别性反映。”

(三) 持久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绝对规模的扩大及其占GDP比例的持续上升,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改变其逆差状态和降低逆差规模,美国曾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过以“汇率”和“关税”为手段的贸易战。

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五国签订《广场协议》,旨在通过日元等货币升值以改善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日本等国双边贸易逆差的迅速攀升态势。从短期看,美国贸易逆差的确得到了改善;但是自1992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却出现了持续的恶化(见图1)。

2018年7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截至2019年9月1日,美国已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对另外从中国进口的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中的第一批商品加征15%关税。但是,加征关税后,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以特定的双边贸易差额为目标很可能只会导致贸易转移,并被与其他贸易伙伴差额的变化所抵消,总的贸易差额不会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可知,美国贸易逆差的状态和规模并不会因为“汇率调整”和“关税加征”而发生根本性改善,因而表现出“持久性”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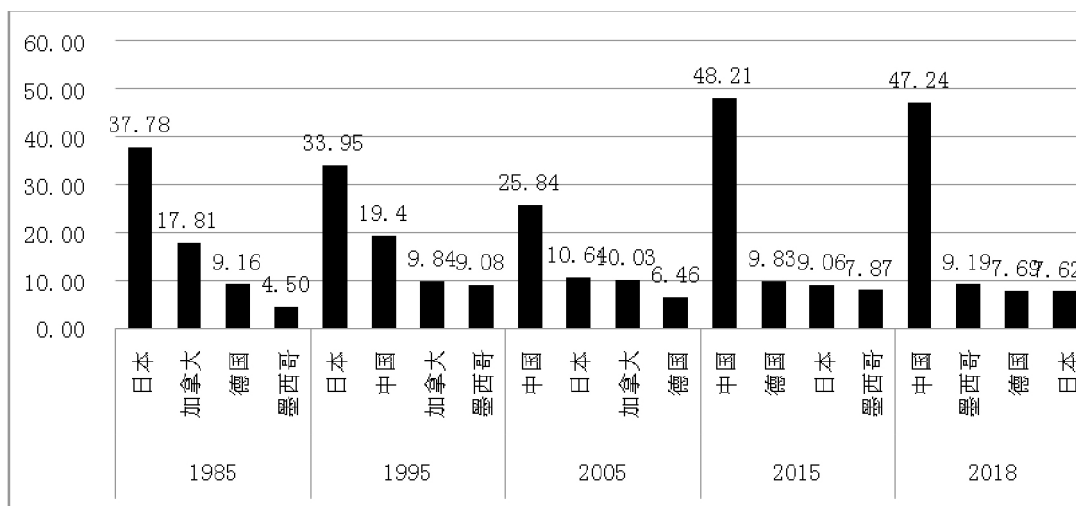


图2 1980-2018年间代表性年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及其占比(%)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 并经本人整理得到上图数据

三、贸易差额的内生性模型

(一)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的推导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存在如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

$$C + I + G + (X - M) = C + S + T \quad (1)$$

式(1)中, $C + I + G + (X - M)$ 表示以支出法衡量的国民收入; $C + S + T$ 表示以收入法衡量的国民收入。

将(1)式变形, 可得到:

$$(X - M) = (T - G) + S - I \quad (2)$$

式(2)中, $(X - M)$ 为贸易差额; $(T - G)$ 为政府储蓄; S 为私人储蓄; I 为总投资。

由式(2)可得出结论1: 一国的贸易差额由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三大宏观经济因素共同决定。

进一步地, 将(2)式中的 $(T - G)$ 和 S 求和, 得到如下的式(3):

$$(X - M) = [(T - G) + S] - I \quad (3)$$

式(3)中, $[(T - G) + S]$ 为总储蓄, 即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之和。

由式(3)可得出结论2: 如果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 $[(T - G) + S] > I$), 该国出现贸易顺差, 且贸易顺差的规模为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差额; 反之, 如果总储蓄小于总投资(即 $[(T - G) + S] < I$), 该国出现贸易逆差, 且贸易逆差的规模为总储蓄小于总投资的差额。

为凸显政府储蓄状况对贸易差额的影响, 借鉴基思·皮尔比姆(2015)的研究^[3], 将(3)式变形可得到下式:

$$(X - M) = (T - G) + (S - I) \quad (4)$$

式(4)中, $(S - I)$ 为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差额。

由4式得出结论3: 一国的贸易差额由政府储蓄以及私人储蓄和总投资差额决定。如果政府储蓄与私人储蓄和总投资差额之和大于零(即 $(T - G) + (S - I) > 0$), 则该国出现贸易顺差; 反之, 如果政府储蓄与私人储蓄和总投资差额之和小于零(即 $(T - G) + (S - I) < 0$), 则该国出现贸易逆差。

如果在式(2)、式(3)和式(4)两边分别除以 GDP, 分别得到如下的式(5)、式(6)和式(7):

$$\frac{(X - M)}{GDP} = \frac{(T - G)}{GDP} + \frac{S}{GDP} - \frac{I}{GDP} \quad (5)$$

$$\frac{(X - M)}{GDP} = \frac{(T - G + S)}{GDP} - \frac{I}{GDP} \quad (6)$$

$$\frac{(X - M)}{GDP} = \frac{(T - G)}{GDP} + \frac{(S - I)}{GDP} \quad (7)$$

式中的各变量均为比率形式, $\frac{(X-M)}{GDP}$ 为贸易差额率, 其他以此类推, 不再赘述。

其中, 式(5)、式(6)和式(7)分别为式(2)、式(3)和式(4)的比率形式, 式(2)、式(3)和式(4)的结论仍然适用。

(二)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的提出——静态模型

基于结论1和结论2, 本文提出如下的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1(见图3)。由该模型可知, 一国的贸易差额内生于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由总储蓄和总投资的相对规模决定。总储蓄由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组成。因此, 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形成一国贸易差额的可能内生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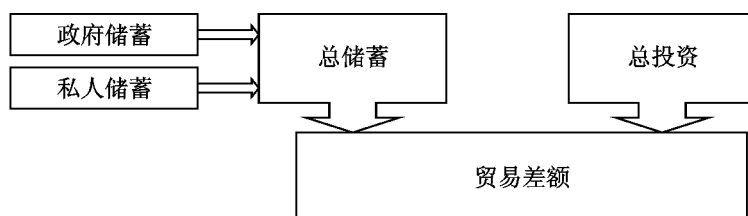


图3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1

基于结论3, 可以得到贸易差额的内生性模型2(见图4)。即一国贸易差额的状态及规模取决于政府储蓄以及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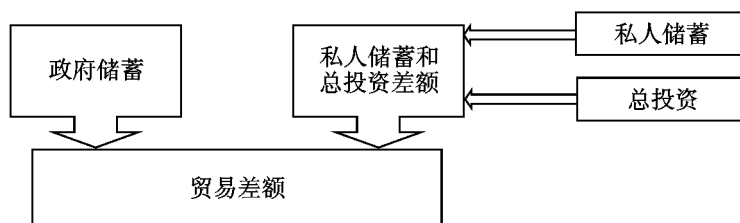


图4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2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1和2均表明, 某一时点一国贸易差额内生于一国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等三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状况, 属于贸易差额决定的静态模型。

(三) 贸易差额内生性的提出——动态模型

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 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变化会导致贸易差额的变化。在其他两个经济变量给定的情况下, 某一变量发生变化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如表1所示。

表1 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变化对贸易差额的影响

变量	变动情形	对贸易账户差额的影响	相关关系
政府储蓄	改善 恶化	贸易差额改善 贸易差额恶化	正相关关系
私人储蓄	上升 下降	贸易差额改善 贸易差额恶化	正相关关系
投资	上升 下降	贸易差额恶化 贸易差额改善	负相关关系

注: 假定其他两个变量给定的情形下, 研究某一变量的变化对贸易差额的影响。

由表1可知:

第一, 在给定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情形下, 一国政府储蓄与贸易差额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一国政府储蓄上升, 该国贸易差额改善; 反之, 一国政府储蓄下降, 该国贸易差额恶化。在某些时期, 一国财政赤字扩大导致贸易赤字的扩大, 这被称为“双赤字”。

Menzie D. Chinn 和 Hiro Ito(2007) 对19个工业化国家1971-2004年的实证研究表明, 财政余额每增加1%, 经常账户(贸易账户)余额将会改善0.16%。而他们对美国的研究则证实了财政盈余每提高1%, 美国的经常账户(贸易账户)余额将会改善0.4%, 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4]。Hiro Ito(2009)的研究进一步

证实了上述结论。Georgios Karras(2019)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的研究表明:政府赤字率每提高1%会导致贸易赤字率提高0.25%^[5]。

第二,在给定政府储蓄以及总投资的情形下,一国私人储蓄与贸易差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国私人储蓄上升,该国贸易差额改善;反之,一国私人储蓄下降,该国贸易差额减少。

私人储蓄包括家庭储蓄和公司储蓄两个部分。大多数文献从家庭储蓄的视角研究指出私人储蓄和贸易差额的正相关关系。而Zhibo Tan, Yang Yao 和 Shang-Jin Wei(2015)的研究表明,公司储蓄的高低才是影响一国经常账户(贸易账户)差额的重要原因^[6]。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不得不保留较高的留存盈余,具有较高的公司储蓄。因而,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经常账户(贸易账户)盈余或者较低的经常账户(贸易账户)赤字。

第三,给定一国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总投资和贸易差额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总投资增加,该国贸易差额恶化;反之,总投资减少,贸易差额改善。Ioannis Litsios 和 Keith Pilbeam(2017)基于开放经济投资储蓄模型,使用ARDL协整方法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三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投资的提高会显著恶化三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7]。巴罗(2010)和普格尔(2015)的研究均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的原因是其国内实际投资的繁荣^{[8][9]}。

(三) 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的政策含义

基于贸易差额内生性的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可知,对于一个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而言,要减少其贸易逆差,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降低政府的财政赤字,提高政府储蓄水平。该政策适用于“双赤字”情形。第二,提高私人储蓄。第三,减少总投资。正如萨缪尔森(1999)所说“长期中,一国的贸易状况主要反映的是其储蓄率和投资率,减少贸易赤字需要改变国内储蓄和投资水平”。对于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而言,要减少其贸易顺差,需要采取与之相反的经济政策。

四、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呈现如下的波动特征:第一,1980-1987年,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呈现扩大或恶化趋势;第二,1988-1991年,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呈现下降或改善趋势;第三,1992-2006年,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又一次出现了扩大或恶化;第四,2007-2018年,贸易逆差占GDP比例又出现了改善。

基于此,本文将1980-2018年分为四个时期,使用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从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三个经济变量的视角探讨不同时期美国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

(一) 第一个时期:1980-1987年

该时期美国的贸易逆差呈现“恶化”的趋势,并在1987达到了高点,占GDP比例约为-3.1%。

美国政府储蓄尤其是联邦政府储蓄在该时期出现了明显下降^①,其典型表现为政府赤字的上升。其中,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在1983年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占GDP比例为-3.47%。1983年后,联邦政府储蓄出现改善,但仍然处于赤字状态。因而,这段时期美国出现了“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私人储蓄初期较为稳定,但中后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80-1987年间,美国总投资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上述变化导致以下结果的出现:第一,政府储蓄的恶化以及私人储蓄的减少使得总储蓄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第二,总储蓄持续小于总投资,且总储蓄与总投资差额呈现恶化的趋势,这正与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一致;第三,该时期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差额总体呈现恶化趋势。

因此,使用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可以发现:第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联邦政府储蓄的恶化是逆差的主要内生来源;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联邦政府储蓄的恶化和私人储蓄的下降,共同成为了贸易逆差扩大的内生来源。Barry Bosworth(2012)研究认为“里根政府”时期的政府储蓄下降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财政和贸易双赤字”^[10]。普格尔(2015)认为20世纪80年代政府储蓄的减少导致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是该时期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可见,本文的结论与他们并不完全相同。

^① 多恩布什和费希尔(2008)在《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国民收入账户中的“政府”包括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因此,这里所指的“政府储蓄”应该是包括中央政府储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储蓄。因此,美国政府储蓄数据包括联邦政府储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储蓄。

表2 1980-1987年政府储蓄、私人储蓄、总投资和贸易逆差(%)

年份	经济 指标	贸易 逆差	政府 储蓄	其中:联 邦政府 储蓄	私人 储蓄	总储蓄	总投资	总储蓄与 总投资 差额	私人储蓄 与总投 资差额	贸易逆差的 内生来源
1980		-0.68	-0.04	-0.99	22.09	22.05	23.30	-1.25	-1.21	第一,1980年代 早期,联邦政府储 蓄的恶化是逆差 的内生来源。 第二,1980年代 中后期,联邦政府 储蓄的恶化+私 人储蓄下降共同 成为贸易逆差的 内生来源。
1981		-0.50	0.22	-0.64	22.97	23.19	24.27	-1.08	-1.30	
1982		-0.72	-2.19	-2.75	23.90	21.71	22.07	-0.36	1.83	
1983		-1.58	-2.80	-3.47	22.52	19.72	22.25	-2.53	0.26	
1984		-2.70	-1.53	-2.62	23.46	21.83	25.09	-3.26	-1.73	
1985		-2.81	-1.33	-2.36	21.63	20.30	24.18	-3.83	-2.54	
1986		-3.03	-1.45	-2.45	20.32	18.87	23.74	-4.86	-3.41	
1987		-3.12	-0.33	-1.15	19.87	19.54	23.62	-4.07	-3.74	
经济指标 变化趋势		恶化	恶化	恶化	前期稳定中 后期下降	下降	有波动,但 总体稳定	恶化	前期稳定, 中后期恶化	

注:1. 上述数据为各指标占 GDP 比例;2. 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由本人整理得到。

(二) 第二个时期:1988-1991年

从1988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出现了改善趋势;至1991年美国贸易逆差占 GDP 比例降至-0.5%。

如表3所示,该时期的私人储蓄总体保持稳定,但美国联邦政府储蓄的恶化导致了政府储蓄的下降;因而,总储蓄出现了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总投资也出现了下降。因此,政府储蓄、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上述变化产生了下述结果:第一,总储蓄与总投资差额仍然为负值,但出现了改善;第二,私人储蓄与总投资的差额也出现了改善。

因此,导致该时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内生来源为联邦政府储蓄的恶化。

表3 1988-1991年美国政府储蓄、私人储蓄、总投资和贸易逆差(%)

年份	经济 指标	贸易 逆差	政府 储蓄	其中:联 邦政府 储蓄	私人 储蓄	总储蓄	总投资	总储蓄与 总投资 差额	私人储蓄 与总投 资差额	贸易逆差的 内生来源
1988		-2.18	0.10	-0.78	20.45	20.55	22.82	-2.26	-2.36	联邦政府储蓄的 恶化是该时期贸 易逆差的主要内 生来源
1989		-1.65	0.17	-0.57	19.49	19.67	22.51	-2.84	-3.01	
1990		-1.35	-0.66	-1.17	19.33	18.67	21.52	-2.85	-2.19	
1991		-0.50	-1.58	-1.75	20.31	18.72	20.11	-1.38	0.20	
经济指标 变化趋势		改善	恶化	恶化	稳定	下降	下降	改善	改善	

注:1. 上述数据为各指标占 GDP 比例;2. 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由本人整理得到。

(三) 第三个时期:1992-2006年

从1992年起,美国贸易逆差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恶化期;至2006年,贸易逆差占 GDP 比例已经达到了历史性高点,约为-5.5%。

如表4所示,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储蓄尤其是联邦政府储蓄总体上出现了显著改善:联邦政府赤字逐渐下降,1997-2001年甚至出现了盈余;2002-2006年又出现了赤字,但占 GDP 比例均较低。与政府储蓄改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时期私人储蓄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总储蓄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因“新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总投资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总投资增长幅度超过了总储蓄增长幅度,因而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差额出现了持续恶化。私人储蓄和总投资的差额也出现了恶化趋势。

因此,该时期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私人储蓄的下降和总投资的上升。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是,总投资成为该时期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之一。巴罗(2010)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贸易逆差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国内总投资率的上升造成的。在他看来,高新技术部门投资的增长超过了实际国民储蓄正常的增长,因此很大部分增加的投资必须通过向外国人借款融资。同时他也反对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预算赤字是造成2003-2006年贸易逆差主要原因的观点,巴罗同样认为是由于总投资比率的上升扩大了该时期美国贸易逆差。本文与巴罗(2010)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本文的研究表明,除总投资以外,私人储蓄的恶化也是该时期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

表 4 1992 - 2006 年代表性年份政府储蓄、私人储蓄、总投资和贸易逆差 (%)

年份	经济 指标	贸易 逆差	政府 储蓄	其中: 联邦政 府储蓄	私人 储蓄	总储蓄	总投资	总储蓄与 总投资 差额	私人储蓄 与总投 资差额	贸易逆差的 内生来源
1992		-0.60	-2.88	-2.93	20.48	17.60	20.07	-2.47	0.40	
1994		-1.35	-1.18	-1.44	18.95	17.77	21.27	-3.50	-2.32	
1996		-1.28	0.16	-0.31	19.39	19.55	21.70	-2.14	-2.30	
1998		-1.83	2.52	1.73	18.77	21.30	22.95	-1.65	-4.18	
2000		-3.63	3.84	3.10	16.90	20.74	23.67	-2.92	-6.77	私人储蓄的下降 和总投资的上升 是贸易逆差内生 来源
2002		-3.83	-1.44	-0.95	19.76	18.32	21.70	-3.38	-1.94	
2004		-4.99	-1.84	-1.80	19.56	17.72	22.65	-4.93	-3.09	
2006		-5.51	0.43	-0.19	18.80	19.23	23.53	-4.29	-4.73	
经济指标 变化趋势		恶化	总体改善	总体 改善	下降	总体 改善	上升	恶化	恶化	

注: 1. 上述数据为各指标占 GDP 比例; 2. 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由本人整理得到。

(四) 第四个时期: 2007 - 2018 年

2008 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后, 美国贸易逆差占 GDP 比例较“危机前”出现了明显改善。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 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大规模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救市和经济刺激, 导致联邦政府赤字连创历史新高, 2009 - 2012 年该赤字占 GDP 比例均已超过 -5%。2013 年以来该比例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然超过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表 5)。因此, 该时期联邦政府储蓄的下降导致了政府总储蓄下降。私人储蓄呈现上升趋势, 使得总储蓄在波动中呈现上升趋势, 总投资较为稳定。因此, 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差额出现了改善趋势, 私人储蓄与总投资的差额也有改善。总之, 联邦政府储蓄的恶化成为了该时期贸易逆差的内生来源。

表 5 2007 - 2018 年代表性年份政府储蓄、私人储蓄、总投资和贸易逆差 (%)

年份	经济 指标	贸易 逆差	政府 储蓄	其中: 联邦政 府储蓄	私人 储蓄	总储蓄	总投资	总储蓄与 总投资 差额	私人储蓄 与总投 资差额	贸易逆差的 内生来源
2007		-4.88	0.03	-0.36	17.51	17.55	22.59	-5.04	-5.07	
2008		-4.81	-2.88	-2.75	18.12	15.23	21.11	-5.88	-2.99	
2010		-3.30	-7.84	-7.21	23.26	15.42	18.74	-3.32	4.51	
2012		-3.31	-5.35	-5.04	24.10	18.74	20.02	-1.27	4.08	
2014		-2.79	-1.83	-1.90	22.17	20.34	20.77	-0.43	1.40	联邦政府储蓄的 恶化是贸易逆差 的内生来源
2016		-2.68	-2.05	-2.16	20.66	18.61	20.32	-1.70	0.34	
2017		-2.83	-2.11	-2.29	21.01	18.89	20.58	-1.69	0.42	
2018		-3.03	-3.25	-3.53	22.15	18.89	21.11	-2.21	1.03	
经济指标 变化趋势		改善	恶化	恶化	改善	改善	稳定	改善	改善	

注: 1. 上述数据为各指标占 GDP 比例; 2. 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由本人整理得到。

对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贸易逆差内生来源分析表明, 美国巨额全球贸易逆差或来源于政府储蓄的恶化, 或来源于私人储蓄的下降或总投资的上升, 或兼而有之。总之, 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内部。因此, 不论是以“汇率”还是以“关税”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

五、结论

Ronald McKinnon (2013) 研究认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更好的做法是降低政府的财政赤字和提高家庭的储蓄倾向。Zhibo Tan, Yang Yao 和 Shang Jin Wei (2015) 的研究表明, 公司储蓄的高低才是影响一国经常账户差额和贸易差额的重要原因。结合贸易差额内生性模型的政策含义、相关文献以及美国贸易逆差内生来源的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改善美国巨额全球贸易逆差的政策建议:

第一, 减少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 提高美国政府储蓄水平。而要提高美国政府的储蓄水

平,一方面是要增加政府收入,比如增税等;另一方面是要减少美国政府支出,比如减少政府的转移支付、军费开支等。

第二,提高美国私人储蓄水平。提高私人储蓄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一是增加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二是降低美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三是增加美国公司的储蓄。

第三,降低美国的总投资水平。利率是影响投资的重要经济变量,且与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可提高利率减少投资进而减少贸易逆差。

未来,如果美国的政府赤字尤其是联邦政府赤字不减少,美国的私人储蓄不提高,美国的总投资水平不下降,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的状态和规模就不会改变,任何企图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手段都将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 [1] Ronald McKinnon. The U. S. saving deficiency, current – account defici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3, 35(3): 449 – 458.
- [2] Rudolf Bems, Luca Dedola, Frank Smets. US imbalanc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polic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26(1): 523 – 545.
- [3] 基思·皮尔比姆. 国际金融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 [4] Menzie D. Chinn, Hiro Ito.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Assaying the world “saving glu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26(1): 546 – 569.
- [5] Georgios Karras. Are “twin deficits” asymmetric? Evidence on government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1870 – 2013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58(5): 12 – 24.
- [6] Zhibo Tan, Yang Yao, Shang – Jin Wei. Financial structure, corporate saving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5, 54(6): 142 – 167.
- [7] Ioannis Litsios, Keith Pilbea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nexus between investment, fiscal balances an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in Greece, Portugal and Spain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7, 63(2): 143 – 152.
- [8] 罗伯特·J·巴罗. 宏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9] 托马斯·普格尔. 国际金融(第15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10] Barry Bosworth, P. . The decline in saving: A threat to America’s prosperity? [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The Endogenous Source of the U. S. A Global Trade Defici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Model of Trade Balance

FENG Cai, WANG Shuguo, HE Shuzi

(Financial Scho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its trade deficit, the United States has launched many “trade wars”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by “exchange rate” and “tariff” since 1980s. However, none of them can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huge long – term global trade deficit. Based on the national income identity of open economy, this paper derives the endogenous model of trade balance and then uses the model to analyze the endogenous sources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since the 1980s.

Key words: Trade Deficits; Endogenous Source; The Endogenous Model of Trade Balance

(责任编辑: 罗序斌)